

中 · 国 · 皇 · 帝 · 皇 · 后 · 百 · 传

刘 刘

成 裕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刘 刘



燕山大公司图书馆

K827-51/31

或 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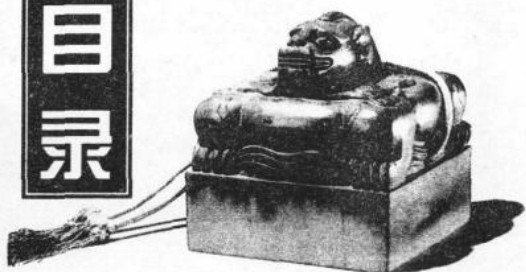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0385744

05

目 录



第一章	东晋建立	(1)
第二章	寒门出身	(51)
第三章	控制朝廷	(70)
第四章	南征北战	(75)
第五章	铲除对手	(94)
第六章	大破后秦	(101)
第七章	减轻剥削	(112)
第八章	刘宋建立	(121)
第九章	骨肉相残	(125)
第十章	明帝即位	(155)
第十一章	平定四方	(159)
第十二章	发展生产	(209)
第十三章	择贤明法	(216)
第十四章	改革弊政	(231)
第十五章	稽古右文	(242)
第十六章	对外关系	(247)
第十七章	由盛转衰	(252)
第十八章	明帝之死	(289)
第十九章	刘宋亡国	(290)

CA24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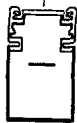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东晋建立



建兴四年（316年），长安陷落，西晋愍帝被俘。次年，从长安逃出来的平东将军宋哲到达建康（即建业，为避愍帝讳而改），宣布愍帝命司马睿“摄万机”的诏令，司马睿称晋王，年号建武，东晋实际上建立起来了。又次年，愍帝死讯传出，在百官的劝进下，司马睿称帝，是为元帝，改元大兴（318年），定都建康。

从司马睿东渡到登极，依赖于王氏兄弟的支持。在此期间，王导居机枢重地，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联合南北士族，大权在握，政令由他而出；王敦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由上流控扼建康。王氏兄弟，权倾内外，司马睿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登极大典那天，司马睿一再邀请王导同登御床，接受群臣朝贺，表示了愿与王氏共有天下的意向。天无二日，王导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旷古未有的礼遇，以太阳岂能与万物同辉为理由，也即承认君臣名分的区别拒绝了。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因而史家们说，这个时候是“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说从





东晋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司马氏为首的皇帝和以王氏为首的士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对比西晋王权凌驾士族，这无疑是一大激变。东晋一代，这种局面始终没有改变，有时士族的权势甚至大于王权，可以随意废立。就此而言，王氏可谓肇其端，其后的庾氏、桓氏和谢氏则是其滥觞，士族的地位及权势达于鼎盛，是名副其实的门阀统治时代。

以王氏为首的南北士族所以支持司马睿，完全是事出无奈。永嘉之乱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晋室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只有晋室才具有号召南北士族及各地军民的力量，如果舍弃晋室，另立新朝，非但会遭到南北军民的一致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必将爆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祸乱。此时此刻，拥有晋室名号，奉行晋室正朔，是南北士族保全身家姓名并进一步扩展其财势的最佳选择。既然西晋宗室丧亡殆尽，司马睿又是名义上的东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了王权与士族平行的局面，那么推奉司马睿，无疑对士族最为有利。

八王之乱是西晋王室之间的一场火拼，皇族在自相残杀中极度衰弱，已经无力凌驾士族之上。东海王司马越尚且要拉拢琅邪王氏，号召士族来维护统治，在其卵翼下的司马睿当然更无别的途径。以他这种与皇统疏而又疏的血统关系，若不容忍王权和士族权力平行的局面，也断难赢得士族们的支持。

总之，东晋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下的产物，也是皇室和士族在权势利害关系制约下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产物。维护王权和士族权力的平衡、维护各大士族间势力的平衡，就成了维护东晋政局相对稳定的基本国策。正由于此，他们虽然以北伐为号召，实际是只图苟安江表，唯恐北伐破坏了这种平衡。即便北伐，也往往是借北伐之名，行争权争势之实。个别权臣则更想利用北伐，抬高自己身价，取晋而代之，这又必然遭到皇室和其他士族的



反对和破坏。这样，东晋的北伐虽然相当多，却总是在大好形势下突然中止，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在东晋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意味着内乱的来临。事实上，平衡极难保持，于是东晋大大小小的内乱也就连绵不绝。

王导是这个国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概而言之，这个国策可以归结为“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八个字。“清静为政”指的是最高统治者和当路权贵们必须清静无为，可以放手到“网漏吞舟”的地步，实质上是听凭士族们为所欲为。“新”的含义是指日后南来的北方士族，“旧”则是较早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抚绥新旧”就是使南北士族都取得奴役人民的特权，都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士族竞相兼并土地和隐匿依附人口。土地兼并空前激烈，名山大川亦为士族鲸吞豪夺，致使老百姓渔猎樵采无地，进入他们的禁地就得缴租纳税。有的官僚，如京口（江苏镇江）的刁逵，占地竟有万顷之多，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都极为罕见。南北权豪拥有的依附农民，超过了封建政府控制的民户，有人惊呼这是“国敝家丰”。山遐出任余姚令，到任八十天，就搜括出隐漏人口万余，触犯了“清静为政”的原则，为当地豪右告发，被免去官职。他要求多留二十天，上司都不同意。官吏们的贪污盗窃更是司空见惯，一旦案发，大都是杀掉个别小吏塞责。地方官吏离任调职，在“送故”的名义下堂而皇之把府库席卷一空。“送故”成了合理合法的行径。有的官吏不但席卷府库，还带走大量供其奴役的兵、吏。所以东晋的政治和西晋可谓别无二致。有人指责王导这样太昏愤糊涂。王导却十分得意，对人说：“有人说我糊涂，后人将会想念我这种糊涂！”

在权势分配上，北来士族占有压倒优势，南方士族处于附庸地位。南方士族对此极为不满。建兴元年（313年），在“三定江南”中立有殊勋的周玘密谋起兵，因泄漏而没有成功，忧愤而死，遗言其子周勰定要为他报仇。建兴三年，周勰终于

刘裕
刘琨

三



纠集了一些南方士族起兵，声讨王导，一时间响应者甚多。只是由于其叔父周札迟疑不决才迅速失败。司马睿和王导因为周氏势力甚强，且牵扯的南方士族较多，惟恐处置不慎，激起大变，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南方士族毕竟难于甘心，只要风吹草动，大都愿意兴风作浪或推波助澜。

在东晋的各种措施中，值得一提的是侨州郡的设置。这既利于使北来士族都有官做，也利于安置南迁的侨民。此制规定，凡隶籍侨州郡者，可享有免除赋役的待遇。这样，就有力地吸引了北方人民的南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民族矛盾的驱使下，北方人民像潮水般地涌向南方。他们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及技能，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为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南北人民对这个腐朽政权的支持，是东晋得以长期存在的主要条件。

东晋君臣苟安江表，决非说没有人主张北伐。真正主张北伐的也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进入权力中心而已。事实上，司马睿东渡后，北伐的声浪一直很高，特别是长安、洛阳相继陷落，更是激起众愤，司马睿也不得不虚以委蛇。因为如果放弃这面旗帜，对他们来说，极端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祖逖北伐。

二

祖逖，字士雅，范阳道县（河北涞水北）人，家世二千石高官，是河北地区著名的世家大族。他自小好武尚侠，慷慨有志，长大后博览群书，探讨古今兴亡大事，性格豁达坦荡，不修边幅。他往来于京师，名声颇大，晋室诸王竞相招揽。东海王司马越掌权后，他曾任司马越府典兵参军，迁洛阳太守，因母丧没有到任。洛阳陷落后，他率亲党数百家向淮泗地区迁



徙。当时司马睿东渡不久，对于与东海王司马越有关系的人惟恐拉拢不及，因此祖逖一到泗口，司马睿便发布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又被征为军諮祭酒，徙居京口。

祖逖不满足于在南方找个安乐场所，对司马睿说：晋室之乱并非由下民造反所致，完全是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造成，才使戎狄有隙可乘，乃致流毒中原。现在百姓不堪戎狄虐害，人人怀有奋起抗击之心。大王真能发威命将，以祖逖等为统帅，郡国豪杰必然会闻风响应，意志消沉之士也将觉醒，予以支持。这样国耻一定可雪。愿大王图之！司马睿对拉拢北来士族可谓不惜功本，对祖逖的建议却相当冷淡，又不便拒绝，只有消极应付。建兴元年（313年），他发布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尽管此时府库中有布二十万匹，绢数万匹，但只给祖逖千人口粮和三千匹布，不给祖逖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就打发祖逖上路了。

祖逖志在匡复，对此毫不介意，率领过去随他南来的亲党部曲欣然过江。船至中流，祖逖慷慨激昂，击楫而誓：如果不能收复中原，济民于水火，祖逖将如东流的大江，一去不返！进到淮阴，他起冶铸造兵器，招募士卒，组成二千余人的队伍，推进雍丘（河南杞县），与石勒在黄河以南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这时石勒已基本平定了河北，正在向河南地区扩张。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河南地区群龙无首，晋室官吏和地方豪强组成一个个武装集团，修筑坞垒堡壁，割地自雄。亦有一些流民集团凭借坞堡抗击石勒。河南，是坞堡星罗棋布的世界，其中势力较大的有新城（今属河南）的李矩，谯城（安徽亳县）的张平、樊雅，宜阳一泉坞（河南宜阳）的魏该，蓬陂的陈川，浚仪（河南开封西北）的陈午，厌次（山东无棣西南）的邵续等，郭默、赵固、上官已等则逞强于新城和宜阳一带。他们有的真心实意抗击石勒，有的无非是打着晋室的旗号招兵



买马，扩张实力，鲸吞他人，有的公然投靠石勒，有的首鼠两端，心怀观望，随时投机。他们互相角逐，兼并扩张，甚至自相残杀，争当地的主宰。

祖逖谋略出众，目光远大，不搞急功近利的活动，力求稳扎稳打。针对河南群雄的态度，他区别对待。对坚持反对石勒，但彼此间有矛盾的坞堡主，祖逖陈述利害，晓以大义，竭力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要他们携起手来，共同对敌。李矩、赵固、郭默和上官巳就是在祖逖多方劝导下，听从其号令的。对于民族气节尚未泯灭，但又桀傲不驯，妨碍北伐大业的坞堡主，祖逖以打辅拉，迫其就范，樊雅和张平就属此类。当樊雅在祖逖的重创下逃窜无所时，祖逖立刻遣使说明自己的目的只在于击灭刘聪和石勒，决不想消灭异己或侵吞他人的地盘。坦诚的态度，开阔的胸襟，坚定的目标，终于使樊雅感动了，归顺了祖逖。对于只图扩张，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投靠石勒，为虎作伥的坞堡主，祖逖穷追猛打，锲而不舍。陈川兵败，向石勒呼救，石虎统军五万驰援，祖逖设计，一举击垮石虎。陈川绝望了，统余部逃窜襄国。石虎命令其部将桃豹进驻陈川的坞堡，祖逖寸步不让，挥军猛攻。双方实力毕竟相差甚大，祖逖只打下了一半。两军相持四十余天，粮食都快用光了。为求全功，祖逖派遣军队截夺对方的粮运，又命千余人用米袋装土后搬入城内，佯装粮食丰足。他授命健卒驮运几袋粮食诱敌，遇到桃豹的抢粮队就弃而逃命。桃豹上当了，误认为祖逖储备富足，而他已经断炊，再也无力抵抗，率部乘夜逃窜，祖逖大获全胜。

祖逖深知争取民心是维系北伐胜败的关键。在北伐过程中，他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就祖逖而言，这可以说是他一贯的传统。青少年时代，他就常把家中的粮食布帛散发给贫困的亲友和四邻。向南方迁徙时，他把车马让给同行的老弱病残，自己步行，所带的衣粮药物，也与大家分享，因此他极受流民的



刘
裕
刘
彧

爱戴，被推为“行主”。到达南方，这些人无依无靠，投托无所，为了求生，难免有“越轨”的举动，祖逖总是出面给他们排忧解难。北伐时祖逖更是如此，他兴建屯田，解决军需粮草，所经之处，收葬枯骨，帮助无力丧葬的百姓。每遇灾害，他开仓及时赈济，帮助百姓恢复生产。他不问贵贱，一律待以恩礼，因此军民关系极好。耆老们被感动得痛哭流涕，把祖逖看成再生父母，说想不到迟暮之年竟能再遇“慈父”。一首歌谣盛传于豫州民间：“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祖逖对百姓的处境考虑得相当周到，对于一时无力收复的地区，他劝这里的百姓及坞堡主表面上服从石勒，免遭石勒的屠戮，他假戏真做，经常派遣游军进攻这些地区，佯装虏掠，杜绝了敌方对这些地区的猜疑。因此祖逖极得人心，石勒凡有举动，百姓便自动前来报告。祖逖对石勒那边可谓了如指掌，动辄有胜。

祖逖严于律己，每战必然身先士卒。他生活简朴，不蓄私产，和部下一同樵采种田。他治军有方，军纪极严，决不允许私掠。他对子弟要求极严，都得勤于耕作，勇于战阵。他爱护部下，信赏必罚，只要有功，哪怕极小，他也力求赏不隔夜。名将好马，祖逖也不例外。他把樊雅逐出谯城时，缴获了一匹雄壮俊逸的千里马，喜不自胜。协助他击败樊雅的友军将领李头见到此马极口称赞，羡慕已极，但见到祖逖对这匹马爱惜备至的神情，只好欲言又止。祖逖知道后，立刻派人把马送给了李头。赏功不惜割爱，非但得到了部下的死力，连友军也发出由衷的感叹：若得此人为主，吾虽死无恨！

祖逖壮大起来了，石勒相当畏惧，轻易不敢窥图河南。为了联络关系，略消祖逖敌忾之情，石勒主动修葺了祖逖的祖坟，表达了他对祖逖的敬重之心。对于这位横行河北的羯族首领来说，实在是罕见的行为。石勒还主动修好，要求双方贸易往来。祖逖深知，此时此刻进军河北，直捣襄国，他的力量远

七



远不够，必须养精蓄锐。为了有足够的给养，而又不影响部下敌忾的情绪，他拒绝了石勒的要求，但又默许边界上的互市。结果祖逖收利十倍，军国物资相当充裕，装备改善了，兵强马壮。形势越来越好，假以时日，他进军河北的格局必然会水到渠成。

祖逖壮大起来了，司马睿和王敦都坐不住了。晋元帝怕祖逖功高难制，又想利用他的实力对付王敦，乃命亲信戴渊出任司、兖、豫、冀、并、雍六州都督，节制和掣肘祖逖。王敦则派人威逼利诱，要祖逖帮助他去反对晋元帝。祖逖北伐不能，又担心内乱将起，激愤病发，大兴四年（321年）死于雍丘，享年五十六岁。河南人民怀念祖逖，闻讯如丧考妣，为他立祠，四时奠祭。

祖逖死了，王敦再无顾忌，一场大乱立刻发生。东晋已无力外顾，石勒乘势南进，祖逖北伐的成果尽数化为乌有，淮河、汉水以北的土地全部为石勒占有。

三

名与器是封建时代权势的象征，名器不可假人，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下封建帝王的信条。元帝登极拉王导同登御床共受群臣朝贺，无非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于心何甘！琅邪王氏支持元帝，只是出于本家族、本集团利益的需要，同样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为。因此，要双方都安于“共天下”的局面，是不大可能的，王与马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必然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皇帝和士族之间如何分割权势的矛盾斗争。

从政治地理来看，扬州是中枢所在，财赋之区，此时人们习惯称它为“内户”。荆州则甲兵所聚，又有相当的财力，凭籍甲兵和财富，可以屏障扬州，号称“外阊”。两州相互依赖，不可缺一。掌握荆、扬两州，就控制了东晋的大局。扬州要控



制荆州，途径无非是加强自身的兵力，分割荆州的权势。为了达到唯帝王独尊的目的，晋元帝正是在这方面下手的。王氏要维持共天下的局面，进而改朝换代，就必须牢牢抓住荆州，进而染指扬州。王马之争首先在荆州展开，并由暗斗逐步发展到明争。

在东晋初年的将帅中，陶侃、周访和祖逖三人较有才望。当王敦镇压杜弢起义，成为东晋军队的实际统帅后，就用借口把荆州刺史陶侃贬逐为广州刺史，发布其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为免除后患，王廙一到任就大张杀伐，矛头对准陶侃旧部，群情骚动。晋元帝乘机征王廙入京为散骑常侍，发布与王敦有矛盾的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岂能心中无数，针锋相对，转周访为梁州刺史、安南将军，镇襄阳。为杜绝元帝再插手荆州，他干脆坐镇武昌，兼任荆州刺史，进一步扩张实力。

王敦，字仲处，晋武帝的女婿，史称他蜂目豺声，刚狠残毒，是个大野心家。南渡之初，他虽与王导二人悉心辅佐司马睿，但天长日久，便发现司马睿相当精明，凡事难以自专，颇有另立新主的想法。不过形势急转直下，他的羽毛未丰，后来还是拥司马睿登极。抓到荆州，手握强兵，他的野心就日益显露出来了。但是周访荆州刺史被夺，心怀怨望，在襄阳招兵买马，明确以王敦为敌，祖逖兵强马壮，以北伐为己任，对王敦的野心也极为不满。王敦左顾右盼，顾忌甚多，只有隐忍。

元帝久有翦除王敦之意，既然一时抓不到荆州，只有先从扬州下手。他起用亲信刘隗、刁协和戴渊，在刘、刁二人的协助下企图借助刑名重振帝王雄风。刘、刁二人乘风承旨，不遗余力地弹劾达官贵人，又建议依据户籍征发扬州地区的“免奴客”（奴婢被释放为佃客后的专有名称）为兵，组建自己控制的军队。不久，元帝发表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镇合肥（今属安徽）；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今属江苏）。

刘
裕

刘
或

九



名为北伐，实质是控制祖逖，把祖逖的力量转移到对付王敦方面去。

元帝此举是极大的失策。第一，借助刑名。弹纠百官，在王权强大之时是正常之举，但在王权与士族权势平行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打击士族，强化王权的措施。也就是说，元帝发出了要改变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信号。南北士族的权益都受到侵犯，引起他们的不满势所必然。特别是王导和王敦，随着权势的受威胁，心中的不满更是溢于言表。第二，元帝东渡，忙于稳定阵脚，准备登基，诸事草创，根本无暇去整理户籍。所谓依据户籍，只可能是昔日西晋的“旧籍”。这个户籍上所牵扯到的只是南方士族，北来士族还来不及造籍登册。那么被征发的“免奴客”，只能是南方士族控制的依附农民，经济利益受到明显的侵犯。南方士族对权势分配已经极端不满，此举无疑是火上浇油，恨不得立刻有人出来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第三，由戴渊控制祖逖，显示了元帝对祖逖的不信任，引起了祖逖的反感。鉴于祖逖较为深明大义，没有倒向王敦，但双方嫌隙已深，为祖逖这股势力后来参加另一场叛乱埋下了祸根。第四，刘隗、刁协和戴渊虽然想加强王权，可是既缺乏政治头脑，又无军事才干，其所作所为反而把南北士族人都推向王氏兄弟一边去了。

大兴三年（320年），周访死，元帝任命甘卓为梁州刺史。甘卓虽敏于治事，却疏于治军，而且有遇事迟疑不决，往往坐失良机的特点。王敦已无后顾之忧。为牵制王敦，元帝又发布其叔譙王司马丞为湘州刺史（治临湘，今湖南长沙）。湘州虽控上流之势，是荆、交、广三州的交会之所，一大军事重镇，但它久经战乱，民户流散，经济凋敝。司马丞才干平平，好说大话而无实学。王敦认为这个人决非将帅之才。明识之士则认为这一任命必将促使祸乱的爆发。次年，祖逖病死。王敦自度对手没有了，他抓住南北士族怨声蜂起的有利时机，决心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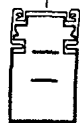


东下。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遣使甘卓，言明己意，约甘卓共举。甘卓抱着后发制人的想法予以默许。王敦大喜过望，随即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武昌，在奏折中历数刘隗、刁协的罪状，在刑名和征发“免奴客”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借以笼络南北士族。吴兴（今属浙江）大族沈充闻风而动，起兵响应。元帝急令刘隗和戴渊入卫建康，以周札为征虏将军驻守石头城（建康西面军事要塞），又发布陶侃为荆州刺史，要他会合甘卓（王敦起兵后才亮明态度，与司马丞联手反对王敦）进攻王敦的后路。

王敦起兵，王导心中暗喜，却又不形于色，还诚惶诚恐地率领在建康的合族子弟每天清晨到台省谢罪，实质是观察动静。由于局势未明，胜负未决，元帝不便公然决裂，此时此刻，尽量缩小打击面无疑较为有利，何况又没有抓到王导的把柄，所以元帝依然任命王导为前锋都督，给以节制诸军的名义。

王敦顺流而下，如入无人之境，兵到石头城，周札立刻投降，建康门户大开。元帝无奈，遣使告诉王敦：“明公若不忘本朝，就请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逊位，退居琅邪，以避贤路！”王敦撇置不理，带兵进入建康。改朝换代，需有说得过去的功业，王敦举兵内向，已犯天下之大忌，何况他也没有足以号召人心的功业可言，陶侃、甘卓和司马丞（后两人不久为王敦所除）还威胁其后方，所以王敦只是逼迫元帝拜自己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将军政大权全部控制手中。这年底，元帝懊恼郁愤而死，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王敦又逼迫明帝拜他为扬州牧，移镇姑孰，屯兵于湖（安徽当涂），就近控制建康。当然，随着王敦大权在握，剪除异己，大肆刑杀，树置亲信，必不可免。刁协、戴渊是非杀不可（刘隗逃奔了石勒）的，他人也难以置喙。周颙





和周札的被杀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周颙，字伯仁，出身汝南的名门望族，少有重名，被称为汝颖奇士，是昔日东海王司马越幕府中的骨干，亦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的核心人物之一，此时官居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尚书，在北来士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王导待罪台省时，一再拜托周颙在元帝面前为他美言几句。周颙表面上不予理睬，骨子里却主张维持共天下的格局，所以在元帝前一再力呈王导忠诚，因为他明白，如果王导有所意外，此时无人再来主持共天下的大局。王敦在组织自己的班底时，一再征询王导的意见，特别是周颙，王敦也感到难以处置，先后提出重用、一般对待和杀三种方案。王导记恨周颙没有对其请托当面表态，拒不置言，王敦干脆以杀了事。周札是周玘之弟，在南方士族中，势力最强大的是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两族。沈充起兵响应王敦，目的在借助王敦除掉义兴周氏，可以独自称强于南方士族。而周札开门迎降，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抬高自己的权位。王敦本来顾忌南方士族势力过大，此时则认为正是挑起他们内哄的大好时机，听凭沈充族灭了周札。一个是北来士族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何况他们对王氏兄弟均无恶意，都遭到了杀戮，这无疑是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王敦不但不愿意维持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也不愿意维持各大士族权势均等的格局。士族们虽然不满意元帝加强王权，对王敦意欲独尊当然也不会支持。王敦起兵之初，他们对王氏与司马氏之争大都抱隔岸观火的态度，现在司马氏已明确表示可以“共安”，也即说愿意回到共天下的轨道上去，而王敦则放出了不予理会的信号，两相权衡，支持司马氏远比支持王氏对他们更有利，何况晋室的旗号在南北两地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因此他们倾向于司马氏了。事后王导回忆起颙被杀的情况，也悔恨不已，一再对其子弟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至于南方士族，对于周札之死，更有兔死狐悲之感。王敦逐步被孤立起来



了，一场倒王的活动在暗中展开，其中最活跃的便是称病退居林下已久的南方士族头面人物纪瞻。

在东晋诸帝中，明帝是较有才干的一个，史称他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善抚将士，和各大士族的关系都不错。为太子时，与纪瞻也交往甚密。这样的人物当然不愿听凭王敦为所欲为。何况他登位后，王敦索取无厌，篡位之念已明，具有加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殊礼，距皇帝也只是一步之差了，只是苦于外无强援，难以动作而已。纪瞻抓住这一点，觐见明帝，提出了重用郗鉴的建议。

郗鉴是屯驻于江淮间的流民帅，在各股流民势力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流民南渡，千辛万苦，没有武装组织不行。一般来说，此时由北而南的流民集团，大都久经战阵，是一支颇为顽强的武装势力。现在荆、扬两地既然已落入王敦之手，明帝除依靠江淮间的流民力量外，别无出路，所以明帝立刻发布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以西诸军事，命其移镇合肥。

明帝注目于江淮间的流民武装集团，王敦也是同样，他干脆表荐郗鉴为尚书令，征其入朝，想以高官拉拢。郗鉴虽是士族，他门第并不高，身为流民帅，要在东晋政权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唯有立功立业一途。所以一见明帝，就参与密商击灭王敦。在他的影响下，实力强大的桓彝、苏峻、刘遐等统帅的流民集团都倒向了明帝一边。精于权术、手段老到的王导对形势的变化十分敏感，何况他也顾忌王敦篡位，为了自身门户，也参加了进去。王导致书王敦之兄王含，声称自己宁为忠臣而死，决不无赖而生，要为“宁国”竭尽全力。王敦已是众叛亲离了。

王敦并非毫无准备，他的心腹沈充和钱凤等又力促再度起兵，代晋自立，这本是王敦的心愿。为求更有把握，他表荐自己的左司马温峤入朝，侦察朝中动静。温峤本是明帝亲信，苦于一时难以摆脱王敦，平时只有虚与委蛇，假充忠诚，有此机

刘裕
刘
或





会，立刻急急上路，一入朝便揭发了王敦的阴谋。

太宁二年（324年），王敦病重的信息传到建康，明帝立刻发布王导为大都督；温峤为秦淮河以北都督，和卞壸共守石头城；应詹为朱雀桥（秦淮河上）南都督。自己率郗鉴、庾亮等出动，讨伐王敦。同时又征调临淮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广陵太守陶瞻等人卫京师。顾忌将帅畏惧王敦的心理，他到处散布王敦已死的谣言。王导假戏真做，带领子弟为王敦发丧，这下果然把士气给鼓动起来了。三吴地区的南方士族也纷纷起兵响应，进攻沈充。

王敦病重难起，令其兄王含统军五万，借口讨伐奸臣温峤，扑向建康。但此时其军队士气已散，王含又不懂军事，结果是一触即溃，王敦气急而死。不久，其余党亦被歼灭殆尽。历时三年的一场内乱终于平息。

四

王敦叛乱失败，琅邪王氏的权势地位受到沉重的打击。明帝抓住时机，以陶侃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应詹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刺史，王舒为安南将军、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荆州尽管仍保持举足轻重之势，但荆州刺史的权力被分散了，昔日挟荆州甲兵威制建康的局面暂时得到缓和。王导的地位虽然十分尊崇，但受到明帝较为明显的冷淡，决策权转到了中书令庾亮的手中。明帝步武帝后尘，更加依赖庾亮（皇后兄）、虞胤（元帝虞皇后之弟），西阳王司马羓和南顿王司马宗。庾亮总掌枢要，虞胤、司马羓和司马宗则掌握禁兵，轮值殿内。其中庾亮是个关键人物。

庾亮，字元规，颍川士族。颍川庾氏兴起较晚，和东海王司马越及元帝司马睿虽有一些渊源关系，但和琅邪王氏相比，